

# 文化启蒙与文学审美的双重变奏

## ——论新世纪以来冯骥才的散文创作

王云芳

(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天津 300191)

【内容摘要】新世纪以来,冯骥才创作了大量散文,主要包括文化考察类和游记类两种。前者直观而鲜明,后者则寄寓深远,它们彰显出冯骥才强烈的文化忧患意识与启蒙精神,以不同方式折射出冯骥才近年来的文化主张,而有的放矢的现实指向则使其超越了以往文化散文的弊端。对于散文创作,冯骥才主张文无定法,他自由穿越各文体间的藩篱,其艺术家的自我身份亦时时“越位”。画家所特有的学识、对色彩的敏感与发现以及自由浪漫的灵魂都为其散文带来了新鲜的审美因素。文化启蒙与文学审美的和谐变奏使其散文具备了很高的文学价值。

【关键词】文化忧患意识 文化启蒙 文学审美

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106(2010)07-0111-03

作为著名的小说健将,20世纪80年代,冯骥才曾以风味儿浓厚的“津味儿小说”饮誉文坛。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冯骥才开始投身繁忙的文化考察活动,但仍笔耕不辍,其创作重心由小说逐渐转移到散文随笔上,亦取得了不俗的成就。2004年,他在《收获》上开设专栏“田野档案”,向读者介绍文化考察过程中的点点滴滴。2009年,又再续前缘,唯将栏目更名为“田野手记”。自21世纪以来,他出版散文集多部,从题材上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记录了他在田野考察或者文化遗产抢救和普查过程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如散文集《抢救老街》和《民间的灵气——癸未甲申田野考察档案》;二是出访国外的散记,如散文集《巴黎,艺术至上》(2001年)、《倾听俄罗斯》(2002年)、《维也纳情感》(2003年)和《乐神的摇篮》(2003年)。这两类散文表面看来截然不同,却好似一枚硬币的两面,从不同角度折射出冯骥才近年来为之奔走呼吁的文化思想,共同演绎着他文化启蒙与文学审美的双重追求。

### 一、文化忧患意识下的“行动散文”

冯骥才在散文集《民间的灵气——癸未甲申田野考察档案》的序言中写道:“有一次,我忽然发觉稿纸的一排排横竖的小方格很像田畦。我的笔不也在这田野中走来走去,不也在思考、感动和叹息吗?有人说,我这些文章是‘行动散文’。我笑道,这个词倒是恰如其分。虽然我不想打什么旗号。”<sup>[1]</sup>“行动散文”的命名可谓入木三分,它揭示出了冯骥才散文中深切的文化忧患意识。

中国台湾学者徐复观认为:“忧患心理的形成,乃是当事者对吉凶成败的深思熟虑而来的远见,在这种远见中,主

要发现了吉凶成败与当事者行为的密切关系,及当事者在行为上应负的责任,忧患正是这种责任感带来的要以己力突破困难而尚未突破的心理状态。”<sup>[2](P20-21)]</sup>忧患意识具有多个层面,如国族层面、社会层面、文化层面等等不一而足。从历史上来看,知识分子文化忧患意识的涌现,大都是在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时刻。如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孔子秉承文化忧患意识,为保存周之礼乐而整理文化典籍;“五四”时期,中西文化的碰撞交流,虽然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不得不采取矫枉过正的办法,全面向西方学习,但其中的有识之士亦从未间断过整理国故以阐发新知的学术研究。

冯骥才文化忧患意识的产生则与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密切相关。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全面推进,社会经济飞速发展,各地在声势浩大的老城改造中旧貌换新颜,天津也不例外。1996年以后,天津开始对老城、原租界建筑以及曾经繁华一时的估衣街进行改造,旦夕之间,生长之地面貌全非,这极大地触动了冯骥才。在一般民众为物质生活的极大丰裕而额手称庆之时,他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那些处于自生自灭状态的底层民间文化的危机。市场经济是一柄双刃剑,它在改善民生的同时亦逐渐催生了以时尚为主导的消费主义文化,加剧了文化全球化的趋势,将那些看似“不合时宜”的传统文化在现代化的名义下消于无形。平心而论,民众为改造现实物质生活而破旧立新无可非议。然而,对民族文化保护意识的缺乏以及盲目向西方看齐的恶习使得人们在破旧的同时亦丢弃了许多有珍贵价值的文化遗产。而这些文化遗产正是我们民族生存的精神之本,是其

\* 作者简介:王云芳(1980-),女,文学博士,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以独特的风貌屹立于世界之林的根基。作为上层建筑,它们虽然无法创造直接的经济价值,但在塑造国人的精神面貌、提高我们民族凝聚力等方面的作用却是无可替代的。

面对这一严峻的文化形势,冯骥才心急如焚。他不得不暂时放弃心爱的文学创作,从书斋跃入田野,在各地民间文化遗产的抢救和普查中辗转奔波。而这也促使冯骥才在偶尔为之的散文写作中贯穿了强烈的文化忧患意识,以期用审美的文字唤醒民众的文化自觉。

这种深切的文化忧患心理在文化考察类散文中表现得最为鲜明。例如面对曾因年画而名噪一时如今却冷清静寂的杨柳青镇,作者写道:“历史在这里好像没有任何作为。是历史的更迭就是如此绝情,还是我们从来没有把民间文化视为一种精神遗产?”<sup>[1](P13)</sup>内丘的纸马古朴神奇,且保存完好,却令人感到一种悲凉的气息,因为纸马的幸存倚赖的是内丘地理位置的偏僻,“我们的文化不是保护下来的,而是被历史遗忘在那里的”<sup>[1](P19)</sup>。客家的土楼构造神奇之处令人叹为观止,但面对现代舒适环境的诱惑以及旅游业的入侵,却逐渐人去楼空。失去了人文生命的浸润,这些土楼好像一只只巨大的蝉蜕趴在群山之间,令人徒生惆怅。冯骥才说:“保护历史民居的最高要求是把人留在里边。这些问题恐怕还没人去想。那么谁想?何时开始去想?”<sup>[1](P71)</sup>……散文中类似的文字比比皆是,其间蕴藏的忧思质疑之情溢于言表,而期望国人行动起来保护自身文化的急迫之意令人无法不为之动容。

如果说这类文化考察散文是以直观的方式记录文化抢救的过程、展示民间文化遗产濒临灭绝与市场化境域中的尴尬地位的话,第二类游记式的文字则暗藏了冯骥才借他山之石以攻玉的文化建构思想。冯骥才在散文《地中海的菜单》中写道:“传统、民间、历史和大自然都是生活之本。当整个世界都陷入声光光电的现代生活,法国南部人却依然故我地守在生活史的源头。故而,在南部可以看到更多古老的民间文化,以及那种世代传承的民间艺人,比如那些耍木偶的,演奏‘音乐车’的,剪纸的。”<sup>[3](P39)</sup>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作者对法国南部人生活方式的赞赏之情将其文化思想表露无遗,即尊重历史,尊重传统,珍视我们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因此,与一般游记不同的是,无论是《巴黎,艺术至上》、《维也纳情感》、《乐神的摇篮》还是《倾听俄罗斯》,作者都绝非单纯的兴之所致或是借以遣怀,亦没有丝毫猎奇心态、以炫耀异域风情为能,他引领读者去感受的往往是那些最能体现当地精神文化的各种象征符号:民风民俗、古老建筑、博物馆、艺术家、音乐家和书法家甚至墓地等,在这些看似寻常却充满人文气息的民间风景中捕捉一个个民族伟大高贵的文化灵魂。这些文字不仅彰显着冯骥才作为艺术家新奇独特的思维方式与激昂充沛的审美感受,更洋溢着一个思想者强烈的忧患之情。例如参观法国的先贤祠,当地人对思本国国家的敬重令冯骥才反思“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先贤、先烈和先祖的祠堂如今在哪里呢?”<sup>[3](P66)</sup>游历巴黎的拉丁区,那些面目斑驳的城墙令冯骥才感叹:“巴黎人的一只脚站在优越的现代世界,一只脚仍留在优美的历史空间里。前者享用物质,后者享用精神。这才真正是现代人的感受。”<sup>[3](P49)</sup>

……类似的瞬间感悟与思考随处可见。这类散文中时时存在着东西两种文化现实境域的交锋,每每思及国内文化发展的现状、国人的精神状况,冯骥才便无法纵情山水。异域民众对艺术的尊重,对自身民族文化传统的珍视与保护常常使其怅然若失,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油然而生。而且,通过游历与思考,冯骥才常常有意识地将异国文化遗产保护的观念、方法以及文化意义传达给读者,于无形中培育着国人的文化自觉。比如描写巴黎人“改造”古老的历史建筑,乃是在保留该建筑文化内涵象征的基础上,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对其内部进行功能性改造。这样,既保存了它的历史文化底蕴,又满足了居民现代舒适生活的需要,最重要的是,历史文化遗产通过日常生活的点滴得以浸润到当代人的精神建构中,从而将本国独特的文化传统延续下去。

冯骥才的散文在体悟民间文化或者异域文明的人文精神之余又有着鲜明的现实指向。他不仅为民间文化遗产的迅速流失忧心忡忡,而且对造成这一文化现象的根源进行了深入思考,从而有的放矢地对中国当前文化建设的缺失与走向提出了许多中肯的见解。比如关于文化现代化的认识误区:许多国人潜意识中仍以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国文化为现代指向,是以在旧城改造中才出现了拆毁历史悠久的古建筑、代之以摩天大楼和仿罗马式建筑之类的社会现象。这种思维的误区主要即在于将文化现代化与经济现代化看成一个同构的过程,一个可以用进化论方法实现的单一模式。冯骥才指出,文化的可贵之处即在于其差异性与多元性,如果不珍视自身的民族文化传统并引以为根基,仅仅功利地学习西方文化的表面,其结果只能是亦步亦趋、在现代化的思潮中迷失自己的文化身份。从整体特征与审美特质来看,冯骥才的散文仍然可以归属到文化散文的范畴。文化散文滥觞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后逐渐形成一股创作潮流。然而,闻风而起的书斋化、学理化的创作模式将文化散文推向了僵化,所谓的知识分子忧患意识逐渐流于大而空的历史感喟,显现出其无力面对现实的虚无。世纪之交,为了挽救文化散文的衰落,在各种媒体炒作下,“行走散文”“应运而生”。但走出书斋并不必然意味着心灵体悟的深化,事实证明,为行走而行走生产出的只是一些漂浮于心灵表面、走马观花式的文字垃圾。相较之下,冯骥才的散文格外可贵,直面现实的勇气与锲而不舍的行动使其避免了主流文化散文的弊端,脚踏实地的文化行动不仅使其散文的忧患意识有着坚实的现实根基,亦彰显出一个知识分子强烈的文化启蒙精神以及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社会责任感,从而为陷入瓶颈的文化散文写作开拓出了一片有真实生命力的文化空间。

## 二、文无定法的审美追求

对于散文的创作,冯骥才自有一套秘诀。所谓文无定法,他的散文创作亦从不拘泥于文法。他总是倾听内心深处的声音,顺应情感表达的需要,将各种体裁的表现手法信手拈来,融为一炉。“五四”时期,周作人曾给美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艺术散文下过一个经典的定义:“外国文学里有一种所谓论文,其中大约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批评的,是学术性的,二是记叙的,是艺术性的,又称作美文,这里面又分出叙

述和抒情,但也很多两者夹杂的。”<sup>[4][P29]</sup>若以此标准来衡量,冯骥才的散文多不合乎“规范”。在文化考察类散文中,他“拆除各种体裁间的藩篱,将散文、随笔、研究和批评等一起混用”<sup>[4][序言]</sup>,以表达他文化考察过程中感受到的复杂情形。这些文字记录了冯骥才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其间既有考古式的研究性文字,又不乏作家对民间文化的审美感悟,既融入了作家对传统文化的忧患意识与理性思考,又将那些惊喜、感动、忧虑、焦迫等诸种情感交叉其间;有的篇什甚至展现出小说的某种特色,比如《武强屋顶秘藏古画版发掘记》就借用了小说的创作手法,将武强古画版的发掘经过描写得悬念迭出、惊心动魄。由此,他的散文抒发个体情感的一面固然展现得是一波三折、淋漓尽致,而其视野之博大、底蕴之丰厚以及审美之灵动又比其他散文高出一格,这无疑得益于冯骥才对各种文体因素的灵活运用。整体看来,这类文字综合运用各种体裁的创作手法,时时冲击着传统散文的文体边界。它们看似芜杂、缺乏精致的审美品味,却更具有一种自然顽强的生命力。散文原本就是最为自由的文体,有着极强的包容性。散文写作的唯一要求是从内心出发,从真实的生命感悟出发。有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个体精神的差异注定了真实的散文写作的形态各异。而且,为了准确生动地传达个体灵魂的声音、细致入微地描摹独特的生命感受,真正的作家永远不会画地自限、将自己拘泥在有限的文体规范内。在文学审美层面,他们孜孜不倦地努力,寻求最为贴近心灵的表达方式,他们既是规范的创造者又是越轨者。正是在这种不懈的审美追求过程中,散文文体才既形成自身独特的传统而又潜藏着悠远的生命力,而遵循一种过于精致成熟的规范只能是散文走向僵化的开始。从这一意义上说,冯骥才散文的无法归类之处正是其生命力之所在。

如果说,冯骥才文化考察类的散文跨越了各文体之间的藩篱,其游记式散文的最大特色则在于冯骥才艺术家自我身份的经常“越位”,使其散文显现出许多纯文人作家所不具备的新鲜因素。艺术家尤其是画家的学识开拓了冯骥才散文的审美视野。他的散文常常穿梭于作家和艺术家之间,以作家的广阔学识去生动地描绘解读那些伟大人物的传奇人生,以艺术家的专业见解带领读者去赏析他们的艺术才能。由此,对于读者所耳熟能详的许多人物,如俄国作家屠格涅夫、莱蒙托夫、果戈理和列夫·托尔斯泰等,他的散文常常能独辟蹊径、开创出新意。而作为画家对色彩的敏感与发现能力亦使其散文增色不少。冯骥才的散文常喜欢描写自然景物,但那些日常生活中的普通风景在冯骥才的审美观照下却往往能化腐朽为神奇,变得流光溢彩、熠熠生辉。如散文《翁弗勒尔》中描写翁弗勒尔的天空:“峥嵘的云团堆积在东边天空,好似重山叠嶂。有的深黑如墨,有的白的耀眼,

仿佛阳光下的积雪。他们后边的天空,由于霞光的浸入,纯蓝的天色微微泛紫,一种很美很纯的紫罗兰色。这紫色深处又凝聚着一种橄榄的绿色。绿色上边有几条极亮的橘色的云,正在行走。这些颜色全都映入下边的海水中。海无倒影,映入海中的景物全是色彩。海水晃动,所有色彩又混在一起。这种美得不可思议的颜色怎么能画出来呢?”<sup>[3][P34]</sup>这一段自然景物的描写令人耳目一新,形成了更深层次的审美享受。一般来说,读者期待视野的不断满足往往取决于作品形式的“陌生化”,是以才有作家对审美形式的不懈追求。然而,这一常规显然不完全适合冯骥才的散文,仔细分析这段文字我们会发现,其陌生化效果的形成不但来源于他作为作家对大自然敏锐的观察力,更与他作为画家所具有的特殊才能密切相关。艺术家的思维方式亦潜在地影响到他散文的内在审美结构。他的散文常常如行云流水,看似散漫芜杂,却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自始至终都有一股情感支撑的文气贯穿始终,直至文章肌体的神经末梢。其激情充沛处,力透纸背,似乎文字都在燃烧;其情感纾缓处,则似悠然而起的琴音,令人驻足。对大自然的热爱、对生命力的赞美、对美的膜拜、对高贵品质的推崇弥漫在他散文的字里行间,无时无刻不向读者展示出一颗艺术家自由浪漫的灵魂。

### 三、结语

文学阅读原本是一种无功利的审美愉悦活动,对读者来说,在短暂时间内释放被日常生活压抑的主体情绪无疑是现代社会心灵救赎的方式之一。然而,作家尤其是中国作家却常常倾向于为文学赋予各种功利目的,启蒙即是其中之一。由此,启蒙与审美经常成为文学作品中交叉进行的双重变奏,其存在和谐与否直接影响到作品的文学价值。在笔者看来,文学审美层面的成功往往是作家启蒙目的得以实现的前提,优秀的文学作品总是在读者无功利的审美愉悦中达到对读者启蒙的功利目的;反之,如果没有文学审美层面的不断创新,读者终将会在一成不变的审美疲劳中放弃阅读行为,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作家的启蒙目的也必然会落空!而冯骥才的散文兼顾到了文化启蒙与文学审美的双重意旨,在审美层面的不懈追求与自我超越中不断为读者带来新鲜的阅读感受,其文化启蒙的目的也仿佛春雨般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深深地植入了读者的心中。

### 参考文献:

- [1]冯骥才.民间的灵气——癸未甲申田野考察档案[M].作家出版社,2005.
- [2]徐复观.中国人性史论:先秦篇[M].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20-21.
- [3]冯骥才.域外手札[M].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
- [4]周作人.谈虎集[M].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